

李克
王郁琦 编
石晓虹



李战在狮城

——记1990年第三届亚洲大专辩论会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舌战在狮城

王亚明题



——记1990年第三届亚洲大专辩论会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舌战在狮城

李 克 王郁琦 石晓虹 编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 北碚)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经销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00 插页2 字数130千

1992年3月第一版 1992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

ISBN7—5621—0659—2/G·473

定价：2.30元

序　　言

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们这些生长在各自的小天地里的年轻人走到了一起，虽然前后只有短短的两周，但是过多的思索和回忆却使我们久久不能平静，于是相约写下了这些东西，既是为了给昨天划上一个完美的句号，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从我们的身上、从我们的经历中了解些什么、想起些什么……

一九九〇年七月，由新加坡广播局举办的“第三届亚洲大专辩论会”在这个美丽的岛国再次拉开序幕，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六所著名学府的辩士们齐聚一堂，再次为争夺这两年一届的辩论会冠军而展开激烈的唇枪舌战。如果说哪一支队伍仅仅象宣传的那样是为了学习、为了友谊而来的，那只能是自欺欺人，或者说是疑兵之计，因为在我们最初看来，辩论会的战绩不但代表了一所大学的声誉，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不同教育体制的优劣。特别是作为本届比赛夺标呼声最高的两支队伍——南京大学队和国立台湾大学队，一支为了卫冕，一支为了“雪耻”，相互间的竞争可以说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以至于在开始的几天里，虽然我们在公众面前露脸最多，相互间也显得很亲善，但大家私下都明白，这些做法只不过是场下竞争的一部分，可以说在我们的笑脸中都带着多多少少的虚假的或是掩饰的成份，这一切不但使我们觉得别扭，而且也是

“台大”同学在分手前的倾述中表露出来的疑惑。

也许正象我们队的一位辩友所说的，中国人的自尊心太强，以至于往往在不自觉中给自己加码，甚至把一项带有娱乐性的比赛本身也当作了一项神圣的事业。八八年复旦大学与台湾大学就“儒家思想能否抵御西方歪风”展开辩论之前，台湾有些报纸就已把这场比赛看成是四十年来大陆、台湾两大教育体系成果的总决战。而在今天，各所大学都可以为了这座冠军杯而付出任何代价，却已忘记了这类比赛的真正宗旨之所在。

新加坡人喜欢辩论，也爱看、爱听辩论，自从李光耀总理十年前开展“讲华语运动”以来，华语辩论更是成了上至政府首脑、下至黎民百姓的宠儿，甚至有些人已经把今天的新加坡比作苏格拉底时代的古希腊、诸子百家时期的春秋战国。而作为辩论本身，它不但使观众们领略到华文的优美，了解到当今世界的重大热点问题，而且使大家从辩士们轻松诙谐的言谈中得到享受和休息，这也就其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在他们看来，辩论的胜负是其次的，关键是要“英雄重英雄”。

说来惭愧，这些道理甚至是身为辩士的我们直到重新回到宁静的校园以后才深深领悟了的。在本届比赛中，虽然我们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战绩，但是在从新加坡的归途中笼罩我们的，更多的却是遗憾和惆怅；就是作为“台大队”的同学们，在一度的喜悦之后，却也很快地陷入了忧虑，担心因为一座冠军杯而拉开了朋友之间的心理距离。我至今还记得“台大队”的王郁琦同学在大决赛之后陪我们独守空房的情景，这决不是免死狐悲的假惺惺，而是作为朋友的深深理解

和关心。以至在今天，大家还常常在信件中发出这样的感叹：“我们曾经太过天真地去关注输赢，却让最珍贵的友情在不经意之间从手边滑走了。”

是的，“寻求知识、寻求友谊”本来就是、也应该成为我们大家参赛的宗旨。正象评判先生所说的，能在“亚辨会”上结识那么多朋友，相互切磋辩技，这本来已经是人生一大乐事了，又何必为一些本来就不甚重要的输赢而耿耿于怀呢？其实真正重要的，不是在这单薄的辩论台上的短短几十分钟，而是世界各民族之间的发展进步之争，正象一位老华侨对我们所说的：我们期待着祖国富强、人民安居乐业，而这一切都靠你们青年才俊们了。

还是让我们放眼未来，让所有的炎黄子孙携起手来，为建设一个美丽而富足的新社会而努力吧！

编 者

1991年5月于南京大学

目 录

序言.....	(1)
“亚辩会” 随笔	
——南京大学队 高源.....	(1)
流星岁月	
——国立台湾大学队 王郁琦.....	(15)
隔海追忆	
——南京大学队 姜红卫.....	(30)
舌战在狮城	
——南京大学队 李克.....	(34)
西游记	
——国立台湾大学队 萧振寰.....	(45)
南行漫记	
——香港中文大学队 石晓虹.....	(50)
昔日重来	
——南京大学队 钱竹梅.....	(72)
辩论之我见	
——香港中文大学队总教练 陈永明博士.....	(77)
南京大学队对澳门东亚大学队论辩赛赛后感	
——南京大学队 李克.....	(79)

我辩、我辩、我辩

——国立台湾大学队 刘宏恩.....(87)

稳扎稳打、滴水不漏

——南京大学队 陈勤 李克.....(91)

附录:

各参赛队阵营介绍.....(115)

第三届亚洲大专辩论会赛事介绍.....(118)

第三届亚洲大专辩论会比赛章程.....(120)

“谁先开口”(125)

且看儒将如何舞“枪剑”(134)

各场比赛情况分析.....(138)

太过严肃的辩论会.....(151)

本校辩论队参加1990亚洲大专辩论赛

综合报导.....(153)

我校获1990年亚辩赛亚军.....(156)

艰难鏖战：人类和平共处是一个可能

实现的理想吗？(157)

——南京大学 李克 (整理)

“亚辩会”随笔

——南京大学队 高 源

一、“fine”的国家

刚到新加坡，首先后悔的是以前自己没有去过广州，那种南国海派的气息似乎领略得太少，以致于新加坡广播局华文时事节目组的郭奕好小姐来电话请我们吃饭，电话里的那种音调让我觉得茫然不知所措，太软了，尾音拖得那么长。这种声音在港台电视连续剧中倒是常有，可在我门南京，说话可不是这个味。好在紧接着又接到中国驻新加坡商务代办处打来的问候电话，对方开口一声“同志”才使我们感到这里毕竟还有自己熟悉的语言。

我们五位参加辩论的同学都是第一次出国，就象林黛玉第一次进贾府那样，生怕多说一句话，多走一步路。好在是来参加辩论赛的，总想很快进入角色。否则的话，我真怀疑自己在后面几天里能说出几句话来。几位同学都有一种感觉，好象老天爷故意在开我们的玩笑，平时在陌生人面前话都少得可怜，今天竟到狮城来舌战了。记得报名参加选拔时，自己的时间用完了，对方趁此发起凌厉的攻势，自己当时恨不得愤然退场，以摆脱那种无法还击的窘境。以前还较为安静的我，参加辩论选拔后火气倒是日见其长，有时甚至一脸凶相。为了弥补这一辩论中表现出来的缺陷，力争一个好的电视形象，出征前特意配了一付近于平光的眼镜，以增

加一点书生之气。好笑吗？最好不！也许以后这个道俱还用得上。

来新加坡之前，看了许多介绍这座美丽的城市国家的材料，也听到一些关于她的传闻。记得有人告诉我说，新加坡是一个“fine”国家，这个英文单词一是有“美好的”、“优秀的”的意思，还有一个意思是“罚款”。当时这位朋友活灵活现地向我描述：坐地铁站在车门口要罚二百五十新元（合人民币六百多元）；随地吐痰要罚五百新元；不走人行横道而乱穿马路要罚……。说话时的那种神情仿佛他才从新加坡回来一般。队员们听了后彼此开玩笑说：“到了狮城我可不跟你一起上街，我这点钱还不够你被罚一次呢！”前天晚上当飞机快要新加坡降落的时候，坐在我身边的一位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老师认真地对我说：“欢迎你到新加坡来，不过各方面要小心才是。”这时，自己再不会用玩笑的态度对待这种提醒了。

二、“若加”与“情报”

新加坡与中国虽然同处于儒家文化圈内，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但仍存在明显的差异。当自己坐着方向盘在右前部的小汽车一路左行，望着从高高的政府组屋伸出来的晒衣服的长长的竹杆，整整齐齐地斜插向天空，我感到了两种文化——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在这里的融合。

狮城的饮食业最能体现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交融。“m”招牌下的麦当劳、印度人开的小饭馆、马来人的甜点摊子、广东风味小吃都聚在了一起。如果吃不惯的话，宾馆门口不远就有一家台湾人开的油条店，那里的豆浆油条可是正宗的国内风味。马来西亚有一种叫“若加”（音译）的小吃，就

是把各种东西搅在一起，味道确实不错，所以也有人说，新加坡就象“若加”一样，是各种文化风俗的大荟萃。饮食业中所表现出的风格各异恰恰是新加坡“在差异中求生存、在差异中求发展”思想的一个具体的体现。正如新加坡外交与社会发展部部长黄根成先生所说的那样，“差异不是弱点，反而是长处”。多民族的新加坡在过去正是成功地在差异中取得了团结和协调，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奇迹。九十年代的今天，他们已经将这一思想扩大到国与国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上，设法充分利用彼此间的差异，为各国争取更大的利益。

刚到新加坡的第二天，主办这次大专辩论会的广播局华文时事节目组的郭奕好小姐、伦慧平小姐和何子鸣先生请我们南京大学队的五位队员去一家小贩中心吃饭，我们首先对姓名产生了兴趣。郭奕好小姐是最健谈的，说她的“奕”是一个好的意思，后面再加上一个“好”，不就是“好上加好”了吗？还说她们常把何子鸣误叫为“子鸣”。我开玩笑说：“中国有句成语叫‘子虚乌有’，就是什么都没有的意思。一个是好上加好，一个是什么都没有，这可有点不公平吧。”他们还对姜红卫同学的“红卫”、陈勤同学的文献情报系的“情报”两字提出疑问：小姜以前是不是红卫兵呀？陈勤是不是来搞情报的？听了让我们啼笑皆非。我们首先解释“情报”是“Information”的意思，而年纪最轻的小勤可是最天真的一个，如果说搞情报就是象陈同学这样天真烂漫，我们倒希望天下人都来“搞情报”。至于“红卫”二字，我们善意地杜撰说：这两个字很有讲究，中国有句古诗写道：“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而姜同学

的“红”字则取之第一句的“红”，而第二句的“护”同“卫”，所以“红卫”两字意味深长。一番学究气十足的“考证”使得各位都会心地笑了。

郭小姐还问我们三位男同学为什么起的都是单名（高源、李克、陈勤），是不是大陆的男孩子都喜欢起单名呢？我们真没有想到，新加坡人对大陆如此感兴趣，提出的问题既怪又难以回答。我们只好这样回答，现在国内给小孩起单名似乎是一种时髦，这带来了诸多不便，例如叫“李勇”的人数说不一定比新加坡的总人口（二百九十万）少不了多少，所以有些学者主张多用双姓，如李世民的后代不妨以“李世”为姓，李鸿章的后代不妨以“李鸿”为姓，这样叫“李勇”的人就可以起名叫“李世克勇”或“李鸿先勇”，以解决日益增多的重名现象。

七月一号晚上新加坡作家王润华夫妇请我们去阿波罗吃饭，席间谈到新加坡一则趣闻。前一段时间一头来自马来西亚的大象带领全家老小渡过海峡来到新加坡，法制严明的新加坡人对这群大摇大摆“非法入境”的不速之客依法处置，要将其遣返回国，但苦于无法将其诱上遣返的汽车，万不得已只好找来一头母象，以“色”来诱引那头倔犟的公象上勾，一时成为新加坡的趣谈。回宾馆后，我们将这个趣闻向各队的辩友们兜售，就象当地的印度人兜售小手工艺品一样，一时间，弄得宾馆里“公象……”、“母象……”的声音乱飞，景状甚是壮观。

三、新加坡·七月三日

来到新加坡才知道，我们辩论的题目很多是现在新加坡的热门话题。翻开当地的华文报纸《联合早报》，这一段时

间连篇累牍地登载亚洲“四小龙”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对儒家思想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讨论，而七号晚上，我们将与澳门东亚大学辩论的题目也是“儒家思想是亚洲四小龙经济快速成长的主要推动因素”，我们南京大学代表队持反方立场。到“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来谈“四小龙”成功的奥秘，就如同到一个陌生人家里说人家的家务事一样，我们生怕说出一些根本不着边际的外行话来，更何况。“四小龙”的经济奇迹使得现代新儒学研究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并在新加坡似乎已经达成了一个小小的共识，那就是儒家思想确实推动了经济的发展。这就使在这一公众的焦点问题上我方所持立场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

我们将在九号晚上对新加坡工艺学院的第二场辩论题目，是“亚太区国家应该成立经济联盟”。这个题目也是新加坡的热点问题。李光耀总理曾经说过，新加坡在世界中就好比大洋中的小虾，大鱼能生存，小虾也能生存。在当今世界经济区域一体化的浪潮之中，很多小国纷纷成立一体化的经济组织，以抗衡经济大国的贸易挑战。建国二十五年来时刻为自己的生存谨慎从事的新加坡，同样也面临着未来何去何从的选择，在成立经济联盟的问题上既热心又谨慎。

新加坡的新闻媒介及时抓住这些热点问题，并将之推向整个社会，以引起公众的注意，从而达到宣传国家大政方针和反映民意的双重效果。“亚洲大专辩论会”就是新加坡广播局为此而采用的一种生动、活泼的传播方式，它利用辩论这一具有激烈、机智、幽默特点的独特形式，让新加坡人了解其他华语国家和地区的人对这些热点问题的态度和观点，让电视观众在轻松愉快之中去了解国家大事，关心未来的发

展。在这方面广播局取得了成功，在它的推动之下，各种辩论会成了新加坡人十分喜爱收看的电视节目，从七十年代初到今天，辩论从大学发展到中学，从华语辩论扩大到了英语辩论，各大学、中学都有自己的辩论队伍，辩论队员身经百战，从知识背景、辩论技巧、机智风度各方面得到很大的收益。新加坡还注意从辩论会中挖掘人才，现任公司商行注册局局长的谢雪华女士、国会议员朱为强先生就是在辩论会中被新加坡人所熟知的。

今天晚上，马来亚大学将与国立台湾大学就“大众传播是否应该迎合大众的口味”问题展开本年度亚洲大专辩论会的第一场辩论，而新加坡广播局主办辩论会本身，不就已经使问题有了明确的答案了吗？

四、友谊地久天长

在新加坡的十几天里，紧张之余，松快的时候总是有的。得到我队一致好评的是马来亚大学队，几个队员话虽不多，但一个“真”字所表现出的魅力是无穷的。他们对我们队的两位女同学姜红卫和钱竹梅总是亲切地称“红卫”、“竹梅”，使人听起来既感亲切又觉得真诚。香港中文大学是经验丰富的一支队伍，从早到晚屋子里总是叫喊不断，刘彦红同学总是抱着她那条玩具狗不放，而黄凡在没有赛事的时间里早已跑到超级市场与商店老板“杀价”去了，回来后得意洋洋地向我们宣布：一架苏联产标价为一百八十新元的照像机被他“杀”到了四十五新元。在一大早，我们是决不会听到台大队员的声音的，他们有夜战的本领和晚起的习惯，而且白天里头也“狡猾狡猾的”，不然的话，前前后后八束漂亮的鲜花也不会摆在我队两位女性的桌前。当然，我们三位男

同学也没有被忘记，不过送来的不是香花，却是气味让人难以忍受的新加坡水果之王——榴梿。我不知道新加坡人何以对异乡人见了就逃之夭夭的“怪果”如此痴迷。照理说，台大队员将气味有争议的榴梿带入宾馆是违反宾馆规定的，所以当宾馆小姐循着异味（不！对她来说是诱人的香气）找到我们房间时，我们三人一人才刚吃了一口，但并没有要“奉它为君”的意思（新加坡作家王润华先生在他的诗集《橡胶树》里的“榴梿”篇中写到：

异乡人，你知道吗？
只要你恩爱地吻我一次
你一定会奉我为君。

当宾馆小姐正要一本正经地向我们解释本店规定时，一听说我们要把剩下未吃的几个送给她时，马上换了一付更为亲切的笑容。还说我们没有口福，当地人为吃它甚至不惜倾家荡产哩！并用塑料袋子将她“皇后”抱走。把别人最为喜爱的东西送给别人，其喜乐不亚于别人将自己最喜爱的东西赠给自己。

东道主新加坡工艺学院队给人以稳健之感，特别是该队的资深辩手蔡长裕同学，辩论时总是份量十足，让人难以应对，但这并不妨碍他和他的队友来尽地主之谊，无论是在小贩中心，还是在卡拉OK厅，工院的同学总是无声地尽起主人的职责，现在回想起他们的一举一动，心中充满感激之情。

在这次参赛各队的三十名队员中，竟有九人来自大陆，

除了我队五名队员之外，澳门队的高薇、香港中大的黄凡来自上海，新加坡工院的费迎晓和中大的郭凌来自首都北京，大家谈起在国内的经历时都倍感亲切。三十位队员年龄都在二十岁左右，但性格差异很大。在一次自助餐上，一位队员竟一板一眼地给我们讲起了童话般的故事：“一群大雁列队飞行，一位猎人瞄准了头雁，但打下来的却是最后一只，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反应机敏的辩论队员马上列出种种可能：猎人没算提前量；猎人技术太差；……。“不，你们都错了，那是因为那只不懂事的小雁看到猎人后飞出队列，晃动着翅膀叫着‘打不着，打不着’，结果不幸中弹！”说完后这位同学得意地望着哗然的众人，正而八经地说这就是俗语“枪打出头鸟”的由来，并要我们跳出逻辑思维的陷阱，感受没有逻辑而产生的快意，接着，他又给我们讲了一个“三个毛毛虫”的故事：“三个毛毛虫排成一队，第一个毛毛虫回头说说‘我身后有个毛毛虫’，第二个毛毛虫回头说‘我身后有个毛毛虫’，第三个毛毛虫回头也说‘我身后也有个毛毛虫’，你们知道这又是为什么？”众说皆非，因为答案是：第三个毛毛虫在撒谎！

五、英雄重英雄，胜败亦无妨

十三号离开新加坡回国，紧张的生活结束了，三个多月的“亚辩”培训使得大伙疲惫不堪，在新加坡的十几个日夜更是自顾不暇，没有心思去领略这个花园国家的风采。我们南京大学代表队在七号和九号连续战胜澳门东亚大学和新加坡工艺学院，十一号与A组出线的台湾大学展开最后决逐，不幸以几分之差屈居亚军。

在失利之后总结主观与客观上的原因，这应该是对待问

题的正确态度，更何况对我们这些在校的大学生来说，能参加这样规模的辩论比赛一生能有几次？在我们接到这一任务时，都有一种“此时不搏更待何时”的气概。然而，当辩论的喧闹被往日的宁静代替了的时候，促使我首先去深思的是如何去看待胜负的问题，应该建立什么样的胜负观。

“亚洲大专辩论会”是新加坡广播局为推广政府倡导的普通话运动而举办的一个电视娱乐节目，每两年一次，邀请亚洲六个有华语传统的国家和地区的六支大学代表队参加。在八六年第一届和八八年的第二届辩论会上，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战胜各自的对手，先后获得该年度辩论会的冠军。新加坡人虽然很喜欢看辩论节目，但对他们来说，娱乐是第一位的，胜负倒在其次，况且各种各样的辩论赛经常可见，又有谁会对谁输谁赢而耿耿于怀呢？但这并不等于说，六支参赛队伍都是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前来比赛的。大陆队由于连获两届冠军，这次来新的南京大学队自然成为各队注视的目标，连我队由于飞机班次的原因早各队一天到新也引起了有些队的疑问：是不是广播局偏袒大陆？这使得华文时事节目组的朱亮亮女士不得不在记者招待会上专门对此做出澄清。为了准备这次辩论会，澳门东亚大学早早就开始挑选普通话标准的队员，并与香港中文大学进行模拟辩论；香港中大则挟两年多来在港澳地区大专辩论赛中保持不败战绩出征狮城；新加坡工艺学院在四至六月的假期里更是磨拳擦掌，加紧训练；而实力雄厚的台湾大学干脆公开声称：“志在雪耻！”……。没有一个参加本届“亚辩会”的队伍不是志在夺魁。

然而，代表中国大学生的南京大学队，其身上的负重非